

# 汉学与日本女性的历史性相遇

## ——对江户时期汉学塾女性的考察

张晓霏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 在日本历史中,汉学始终在男性的主导之下,但江户时期的汉学塾中出现了一小部分女性的身影,她们的存在大多由于知识家庭出身和男性家庭成员的支持。汉学塾女性在学习中存在汉诗偏好。她们在男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汉学世界生存和发展,很多时候需要削弱其作为女性的特质,不断在外形、思维方式、才学等方面向男性靠拢,才能在男性主导的评价体系中获得认可。汉学塾经历对女性自身婚姻存在较为消极的影响,却对日本女子教育事业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日本;江户时期;汉学塾;女性

### 一、引言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崇尚文教<sup>[1]114</sup>,女子教育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据统计,幕末明治时期日本男性识字率约为45%,女性识字率则达15%<sup>[2]180</sup>。这主要得益于享保年间(1716—1736)及之后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寺子屋的普及。18世纪末开始,江户等大城市出现了女性经营的寺子屋和授课的女匠师<sup>[3]53-57,88-100</sup>。江户时期女子教育的主要形式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教育内容主要是妇德、妇容、妇功、妇言<sup>[4]</sup>,学习教材主要有《女大学》《女五常训》《女庭训往来》《女学范》《女训孝经》《女小学》《女今川》《女实语教》《女中庸》等女训书。贝原益轩(1630—1714)所著《和俗童子训》中的女子教育论部分,与吉田松阴(1830—1859)的《女训》,均是江户时期论述女性教育的典型著作,吉田松阴甚至提出为八岁以上的士族女子建立女校的构想。但两者的女子教育理论都旨在培养符合封建规范、宜室宜家的女性。归根结底,日本江户时期女子教育的重点是“作为妇人”的教育,而不是与男子平等的“作为人(独立自主的人)”的教育<sup>[5]309</sup>。可以说,江户时期的女子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为结婚而准备”的教育<sup>[6]57</sup>。这种性别观念是江户时期独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的产物,其形成与发展皆契合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因而具有该时代的“合理性”。然而,从现代的角度来看,江户时代也确实可以被称为女性的“压抑时代”和“无为时代”<sup>[7]91</sup>,女性的社会角色和权利受到诸多限制。

[收稿日期] 2024-12-12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25-11-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学术团队项目(23VIXT02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A227)

[作者简介] 张晓霏(<https://orcid.org/0009-0002-3719-8324>),女,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日本汉学教育史、东亚文献学研究。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 33-6000/C

学术界关于江户时期女性教育的讨论<sup>①</sup>重点多在于家庭教育和寺子屋教育,忽略了该时期还有一种普遍存在且重要的教育机构——私塾。江户时期私塾分布广泛,多达上千所,包含汉学塾、兰学塾、国学塾等,而汉学塾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类型。在日本传统观念中,汉学、汉字一直与男性角色相关,而女性则与和学、假名相连。1758年服部南郭(1683—1759)在给江户中期女性汉诗人立花玉兰(?—1794)的《中山诗稿》作序时写道:“若吾邦古之女流,亦以和歌称于世者,则有焉,未闻有唐诗,世阔如斯,则有是哉,所以希见也。”<sup>〔8〕2-3</sup>在汉学塾这类男性色彩极为浓厚的教育机构中,女性一直是稀有的存在。关于江户时期汉学塾中女性角色的讨论更是少见。迄今为止,仅有柯明《江戸女性漢詩の出現:その「育成」に関する一考察》(《江戸女性汉诗的出现:对其“育成”的相关考察》)等少数文献涉及女性在汉学塾的经历。鉴于此,本文试图采用整体和个案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日本江户时期汉学塾中女性的角色及其境遇。

## 二、女性在汉学塾中的融入概况

《日本教育史资料》是明治十六年(1883)开始,由日本政府主导的一场全国性教育普查所收集、整理和编辑的1872年(日本近代教育制度建立)之前的日本教育史料,有着范围广、资料全等特点。这也是日本最早、最系统的有关江户时代教育机构的官方调查资料。本节旨在通过对《日本教育史资料》中三府七县相关资料的整理与统计,探讨江户时期女性在汉学塾中的概况。由于三府七县的数据需要进行比较分析,而数据采集需基于同一史料集以确保可比性,故现有的私塾(汉学塾)资料汇编中,《日本教育史资料》无疑是最佳选择。

江户时期的汉学塾一般指汉学者在自己家中设立,接纳各阶层生徒,以汉学为主要教授内容,以中高等教育为主的私营教育机构。以《日本教育史资料》中大阪府私塾为例<sup>〔9〕224-225</sup>,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以汉学为唯一教学内容的纯汉学塾,只有6所,分别是岁寒书院、心远舍、泊园塾、正己舍、日章学舍和广文舍;第二种,以汉学和笔道、诗文章、诗作为教学内容的私塾,也可以称为汉学塾,有含翠堂、先天堂、簪荀舍;第三种,教学内容除了汉学,还包括国学(皇学、和学)、算、数、医、天文等其他内容,需要根据其教学内容比例来确定是否可以称为汉学塾,如泊云塾、玄龟堂等。只有汉学在该私塾的教学内容中占有主要位置的学塾才能被称为汉学塾,故谨慎起见,第三种暂时不能纳入汉学塾的研究范围。以此判断,根据《日本教育史资料》,大阪府的20所私塾中汉学塾占9所,比例达45%。此外,关于私塾的开业和废业时间,资料多有缺失,故将其隆盛年代也作为考虑因素,即只要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即可认为是江户时期私塾:(1)开废业年代均在江户时期;(2)隆盛年代在江户时期。据此可知,江户时期大阪府有岁寒书院、泊园塾、正己塾、广文舍、风航馆、含翠堂、赤井泰造塾<sup>②</sup>、学半馆、善学馆、先天堂等12所私塾,其中汉学塾有岁寒书院、泊园塾、正己塾、广文舍、含翠堂、先天堂、簪荀舍7所,占比为58.3%。这7所汉学塾中包含女性师生的只有泊园塾和先天堂两所(参看表1),在江户时期大阪府私塾总数中占比为16.7%,在汉学塾中占比为28.6%。而且,根据现有资料,即使是这两所汉学塾也仅仅各有两名女学生。

以上述同等标准筛选和统计江户时期京都府含有女性师生的汉学塾,可知京都有作新塾、一洗

① 主要包括任梦溪《日本近世における儒教と女子教育》(关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天野晴子《女子消息型往来に関する研究: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女子教育史の一環として》(风间书房1998年版)、志贺匡《日本女子教育史》(玉川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石川谦《女子用往来物分類目録:江戸時代に於ける女子用初等教科書の発達》(讲谈社1946年版)、松田智子《近世における女子教育史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江戸時代末期の女子教育について》(《奈良学園大学紀要》2015年第3集,第125-134页)、白石广子《江戸時代女性の教育と教養:旅日記にこめられた思い》(《江戸連》2010年第5卷,第2-7页)等。

② 在《日本教育史资料》中缺失名字的私塾,必要时笔者以塾主姓名为其命名。

堂等29所私塾,其中汉学塾11所,包含有女性的只有讲习堂、修正舍、浅野织卫塾3所,在私塾中占比为10.3%,在汉学塾中占比为27.2%。其中,上述3所汉学塾中学生男女比例分别为322:3、60:3、80:10(参见表2)。

表1 江户时期包含女性师生的大阪府汉学塾

塾名	教学内容	隆盛时期	学生男女比	塾主
泊园塾	汉学	弘化嘉永年间(1845—1855)	80:2	藤泽东亩
先天堂	汉学诗文章	文久二年(1862)	78:2	柘植熙

注:资料来源于文部省总务局编《日本教育史资料》第八册,(东京)富山房1904年版(以下不再标注出处)。

表2 江户时期包含女性师生的京都府汉学塾

塾名	教学内容	隆盛时期	学生男女比	塾主
讲习堂	汉学	宽永五年(1628)	322:3	松永昌言
浅野织卫塾	汉学	天保六年(1836)	60:3	浅野织卫
修正舍	汉学性理	文久年间(1861—1864)	80:10	柴田谦藏

注:资料来源于《日本教育史资料》第八册。

江户时期东京府有私塾55所,其中有苍雪社、轭轳堂等32所汉学塾,包含女性师生的汉学塾8所,在私塾中占比为14.5%,在汉学塾中占比为25%(参见表3)。

表3 江户时期包含女性师生的东京府(江户)汉学塾

塾名	教学内容	隆盛时期	学生男女比	塾主
苍雪社	汉学	文久元年(1861)	200:20	宫原成太
汉学教授所	汉学	天保十三年(1843)	70:5	堀江太仲
惜阴塾	汉学	文政(1818—1831)中叶	100:1	平田宗敬
克己堂	汉笔诗文	天保十年(1840)	30:15	小松原辰三
乾乾堂	汉学	元治年代(1864—1865)	60:4	冈寿考
芙蓉馆	汉学	天保十三年(1843)	35:7	服部元彰
翠云学校	汉学	文久二年(1862)	90:10	松角近义
諏访慎塾	汉学	万延庆应年间(1860—1868)	400:5	諏访慎

注:资料来源于《日本教育史资料》第八册。

接下来选取日本本州岛关东地区群馬县、近畿地区兵库县、东北地区秋田县、中国地区岛根县、中部地区爱知县、九州地区长崎县、四国地区德岛县的私塾作为日本地方私塾的代表,根据三府(京都、大阪、东京)的标准对其江户时期私塾、汉学塾以及包含女性的汉学塾数目进行统计,结果参看表4、表5。

从中不难得出以下三点结论:其一,包含女性的绝大多数汉学塾的隆盛期在江户时代后期,可以合理推断,大部分汉学塾女性出现在这一时期,这一点在下文的案例分析中也能得到印证。这主要是因为江户后期不论文化、教育都获得了较大发展,公、私教育机构的数量呈现出极为明显的增长。其二,三府包含女性的汉学塾比例尤其高,至少达到25%,可见三府汉学塾中的女性比例虽仍然无法与男性相比,但比起地方,大都市中女性汉学教育环境还是更友好一些。其三,在笔者统计的三府七县中,汉学塾中的女性皆为学生,并未发现女教师的身影,可见女性在江户时期能进汉学塾中学习已是难得,成为汉学塾中女教师更是罕见。这主要是因为,成为汉学塾教师需要具备较高的汉学水平,而女性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之下要达到这种水平较为困难。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三府七县的统计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角,但这些数据并不能涵盖所有细节。因此,不能

绝对地认为女性汉学塾教师在历史上完全缺失。在下文的详细案例分析中,我们将看到女性汉学塾教师的身影,尽管她们的出现频率相对较低,但确有其例。

表4 江户时期三府七县私塾、汉学塾、包含女性的汉学塾数目及其比例

三府七县	私塾 总数	汉学 塾数	包含女学生的 汉学塾数	包含女教师的 汉学塾数	包含女性的汉学塾占 汉学塾总数比/%	包含女性的汉学塾 占私塾总数比/%
东京府	55	32	8	0	25	14.5
京都府	29	11	3	0	27.2	10.3
大阪府	12	7	2	0	28.6	16.7
群馬县	9	8	2	0	25	22.2
兵库县	35	27	1	0	3.7	2.8
秋田县	45	39	3	0	7.7	6.7
爱知县	21	10	2	0	20	9.5
长崎县	22	4	0	0	0	0
岛根县	33	13	0	0	0	0
德岛县	15	10	2	0	20	13.3

注：资料来源于《日本教育史资料》第八册、第九册。

表5 江户时期包含女性师生的群馬县、兵库县、秋田县、广岛县、爱知县、长崎县、德岛县汉学塾

塾名	教学内容	隆盛时期	学生男女比	塾主
群馬县(2)				
仓田务塾	汉学	文久三年(1863)	115:3	仓田务
安中乡学校	汉学	元治元年(1864)	31:6	岩井友之丞
兵库县(1)				
转开堂	汉学诗文	嘉永三年(1850)	30:1	壁圆寺慈猛
秋田县(3)				
斋藤才治塾	汉学笔道	安政元年(1855)	35:5	斋藤才治
荒川玄硕塾	汉学笔道	文久元年(1861)	82:8	荒川玄硕
近藤甚一郎塾	汉学笔道	庆应三年(1867)	70:10	近藤甚一郎
爱知县(2)				
三宅俊司塾	汉学笔道	元治元年(1864)	24:6	三宅俊司
养源学舍	汉学	天保年间(1831—1845)	90:5	彦阪作十郎
长崎县(0)				
岛根县(0)				
德岛县(2)				
五敬堂	汉学习字诸礼	文政三年(1820)	60:20	山下寅一郎
比仙居	汉学习字	弘化嘉永年间(1845—1855)	70:13	吉成由雄

注：资料来源于《日本教育史资料》第八册、第九册。

### 三、汉学塾女性的家庭背景

江户时期学习汉学的女性多出自儒者或者医者家庭<sup>[10]130</sup>。首先,儒者家庭因先辈的汉学积累,家中汉学氛围浓厚,耳濡目染之下,更容易培养出有汉学素养的女儿。兹举三例。

其一,野中婉,日本海南朱子学<sup>①</sup>权威野中兼山(1615—1663)的第四女,她幼时与父亲同被幽禁于幡多郡宿毛地区,但即使在狱中也与兄长一起学习汉学,后也曾在儒者谷秦山(1663—1718)汉学塾中学习儒学,最后成长为一名极具才气的汉方医,救人无数。

其二,大田兰香(1798—1856),著名儒者大田锦城(1765—1825)之女,幼时即跟随父亲学习汉学,善汉诗和书画,著有《八叉诗集》(《兰香诗集》和《兰香杂抄》的合集),并曾在父亲的汉学塾中教授弟子。其侄子太田才次郎在《旧闻小录》中记载:

兰香先生,名晋,字景昭,曾祖父之女,先大夫之妹也。自幼好学,善诗,工书画,及笄年,嫁于古笔了伴……后先生失意所天<sup>②</sup>,有破镜之叹,乃入于佛界,祝发称兰香尼……著有《兰香诗集》数卷。<sup>[11]26</sup>

其三,三轮田真佐子(1843—1927),京都汉学者宇田栗园(1827—1901)之女,经学者中条庸丸养女,因受家庭熏陶,从小接触汉学,曾在梁川星岩(1789—1858)的汉学塾中学习,并善诗文,有诗《寄怀于大人在军》:

昭芳夕丑议纷纷,世事变更真若云。李白桃红春雨里,碧纱窗下远思君。<sup>[12]149-150</sup>

她自己在回忆录中提到,因为出生于儒学世家,从小就阅读经书<sup>[13]18</sup>。真佐子在其养父的汉学塾典学舍中也曾代父授课。

其次,医者家庭同样作为知识阶层的家庭,也具有较好的汉学氛围。因为江户时期医家不论是汉方医还是兰医,都需具有较好的汉学学习经历,不通汉学几乎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尤其是江户时期有一专门称呼“儒医”,形容身兼儒者和医者两重身份的人。著名的汉诗人江马细香(1787—1861)的父亲江马兰斋(1747—1838)即是一名“儒医”,他既是美浓大垣藩医,同时也是一位儒者,著有《论语训诂解》二十卷。龟井少琴(1798—1857)的祖父、龟井塾的创立者龟井南冥(1743—1814)曾跟随荻生徂徕和僧大潮(1676—1768)学习儒学,又跟随永福独啸庵(1732—1777)学习医学,是筑前福冈藩有名的儒医,亦有《论语语由》等著作。因此,医者家庭中能培养出有汉学素养的女性也合乎情理。比较著名的出自医师家庭的汉学女性如吉田袖兰(1797—1866),是京都医师吉田南涯(1752—1826)的女儿,曾与丈夫大仓笠山(1785—1850)一起在赖山阳(1780—1832)的汉学塾中学习书法和汉诗,在当时的京都与江马细香、梁川红兰(1804—1879)一并拥有“闺秀诗人”的美名<sup>[14]19</sup>。野口小蘋(1847—1917)是明治大正时期的画家,与奥原晴湖(1837—1913)合称当时女流南画家的“双璧”。野口小蘋的父亲是汉方医松村春岱,她曾在小林卓斋(1832—?)门下学习汉学。

大多数的汉学塾女性出身于儒者或者医者家庭,这体现了知识家庭对女儿的汉学熏陶。同时,亦可发现,一些父亲对女儿的积极培养和支持超越了当时普遍的男尊女卑观念。迹见花蹊(1840—1926)、原采蘋(1798—1859)和高场乱(1831—1891)就是三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迹见花蹊是幕末明治时期著名的学者、画家、书法家、教育家。她十七岁时前往京都,在宫原节庵(1806—1885)的汉学塾学习诗文、汉学和书法;十九岁回到大阪,在后藤松阴(1797—1864)的汉学塾中继续学习汉学。王韬在《淞隐漫录》第十二卷《花蹊女史小传》中引用了以下评价:

天下之广,四海之大,须眉男子毕生无闻者,亦复何限!而女史以一巾帼,名达天阁,华族贵人,咸执弟子礼,西洋数万里外之人,亦知爱重其笔墨,令女就学焉,岂不盛哉!如女史者,可不谓旷世之奇女子乎哉!<sup>[15]433</sup>

<sup>①</sup> 海南朱子学是日本朱子学一大流派,为南村梅轩所创,初时流行于土佐国(今高知县)一带,也称“南学”。

<sup>②</sup> 意为依靠信赖之人,此处指兰香丈夫。

迹见花蹊的父亲迹见重敬在日本国学和汉学方面的素养颇为深厚,曾开设寺子屋,教授近乡子弟读书习字以维持生计,花蹊也在父亲的寺子屋中接受了汉学启蒙。花蹊立志终身不嫁,以笔墨自娱,其父许之<sup>[16]248</sup>,还鼓励她要专心学习并修得一门学艺,为迹见家扬名<sup>[17]5</sup>。

原采蘋,江户后期著名汉诗人,筑前秋月藩藩校稽古馆教授原古处(1767—1827)的长女,在自家汉学塾古处山堂中跟随父亲学习汉学,也曾在塾中代父授课。采蘋曾在江户等地开设汉学塾,著有《采蘋诗集》《东游日记》等。父亲对采蘋期望颇大,着力培养,在江户居住时期原古处与当地汉诗人频繁交流并将各种经验和书籍传授给采蘋<sup>[18]41</sup>。父亲带她四处游历,曾与广濑淡窗(1782—1856)、赖山阳、菅茶山(1748—1827)、梁川星岩等交游<sup>[19]189</sup>,广濑淡窗的《远思楼诗抄》卷上收录有《原士蒯携女采蘋见访》诗<sup>[20]21</sup>。

高场乱(1831—1891),幕末明治时期的汉学教育家、眼科医生,出生于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父亲对其着力培养。高场乱二十岁时拜入龟井塾学习,四十二岁时开设汉学塾兴志塾(亦名空华堂、人参畑塾)。

还有一种情况是女子由作为汉学家的丈夫引入汉学领域,在其培养和支持下成就学问,其中尤以梁川红兰(1804—1879)和大须贺瘦玉(1846—1878)最为典型。梁川红兰是江户时期著名的女性汉诗人。清代学者俞樾编纂的《东瀛诗选》中有专门一卷日本闺秀诗,他对江马细香和梁川红兰尤为赞赏:“红兰湘梦两芬芳,彤管由来别有光。”<sup>[21]547</sup>红兰十四岁开始跟随被誉为“日本的李白”的汉诗人梁川星岩学习汉诗。当时星岩刚从江户游学回到曾根村,开设名为“梨花村草舍”的家塾教授邻近子弟。红兰十七岁与梁川星岩结婚,之后常与丈夫游历各藩,有诗集《红兰小集》二卷、《红兰遗稿》三卷传世。红兰汉诗题材多样,视野开阔,这与其跟随丈夫四处游历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大须贺瘦玉,幕末明治时期儒者大须贺筠轩(1841—1912)的妻子,精通汉诗,有辞世之诗:“空卧病床八十日,秋风夜雨客怀寒。枕头明灭残灯影,埋骨家山梦里看。”<sup>[14]28</sup>瘦玉婚前并不懂汉学,在丈夫汉学塾旁听的过程中,逐渐学作汉诗,其才情令人称奇。

《广东女子艺文考》对中国闺秀诗人的一般身份有精准概括:名父之女、才士之妻、令子之母<sup>①</sup>。这个概括对江户时期的汉学女性也基本适用。汉学领域始终由男性占绝对统治地位,女性的进入非常困难,家庭中男性(一般是父亲或者丈夫)的支持是大多数女性融入汉学领域的重要基础条件。

#### 四、汉学塾女性的汉诗偏好

汉学是一个博大包容的概念,一般指以儒学为核心、以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江户时期汉学塾女性的汉学成就则主要体现在汉诗方面,如大崎小窗(?—1818)、片山九畹(1779—1836)、吉田袖兰、龟井少琴、长岛春雀、大须贺瘦玉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被誉为“三大女流诗人”的梁川红兰、江马细香和原采蘋,她们三人的汉诗水平被认为可与当时的男性诗人相媲美<sup>[14]11</sup>。红兰和采蘋前文已经详述,此处不再赘言。

江马细香1813年开始在赖山阳的汉学塾中学习汉诗,是山阳的得意门生,师生情感甚笃,山阳去世之后,细香悲痛万分,写下多首怀念老师的诗歌,其中有《奉挽山阳先生》(其三):

列媛诗选今在箱,研朱题赠短文章。痴才弟子非金逸,授业先生是小仓。

①“就人事而言,则作者成名,大抵有赖于三者。其一名父之女,少禀庭训,有父兄为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闺房唱和,有夫婿为之点缀,则声气易通;其三令子之母,侪辈所尊,有后嗣为之表扬,则流誉自广。”参见冼玉清《广东女子艺文考》,见《更生记 广东女子艺文考 广东文献丛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116页。

付尾多年悲失驥<sup>①</sup>,临流竟日似无航。尤思海外媒酬唱,三度红笺赋彩鸾。<sup>[22]11</sup>

此诗深切地表达了细香对老师赖山阳的怀念之情。细香曾与梁川星岩夫妇、小原铁心等交游,组成白鸥诗社,之后自己也曾组建黎祁吟社和咬菜社。细香著有《湘梦遗稿》等,诗风以纤细浓艳著称。

但是,真正擅长儒学这一汉学核心内容的女性反而很少。据笔者所掌握的史料,能够称得上在儒学方面有所成就的汉学塾女性只有高岛文凤(1791—1857)、筱田云凤(1810—1883)和高岛玉蕉(1802—1868)三位。高岛文凤曾被藩侯延请讲学,世人皆称赞其才学,被称为“女学士”。筱田云凤是伊豆医师筱田化斋之女,幼时便聪颖好学,三岁习字,七岁读稗史,跟随父亲前往江户,在梁川星岩门下学习汉诗,在朝川善斋门下学习经学,后成为一代女儒,曾受聘为藤堂侯夫人讲授经学<sup>[23]64</sup>。高桥玉蕉是江户后期的汉学者,著有《玉蕉百绝》,善书法,在江户神田岩代街开设汉学塾讲授汉诗,并曾向仙台藩主及其夫人讲授儒学。而且,像高岛文凤、筱田云凤和高岛玉蕉在儒学上有所成就的女性,也多以汉诗人的身份活跃于江户后期的汉学圈。

江户时期女性在汉学领域的学习和成就主要集中在汉诗方面,故而山本北山的奚疑塾、赖山阳的山阳塾、梁川星岩的星岩塾作为江户后期三所以汉诗出名的汉学塾,都有一些女性身影。首先,汉诗人大崎小窗就曾在奚疑塾中学习<sup>[24]101</sup>,而且被誉为北山竹堤社十大才子之一<sup>[14]5</sup>。赖山阳非常鼓励女性学习汉诗,他的汉学塾也热衷于招收女学生,他曾非常兴奋地写信告诉细香,他能同袁枚(1716—1798)一样招收女弟子:“《随园女弟子诗选》新刻成,朱书小文,赐余,其略云:‘余亦有女弟子,弟子未必让集中数女。其师虽不望随园肩项,然以此差可颉颃。’”<sup>[22]11</sup>信中可见,他虽自认不如袁枚,却以为女弟子未必逊色,为师者的自豪感跃然纸上。梁川星岩的汉学塾不仅培养出了梁川红兰这样著名的汉诗人,还有筱田云凤、三轮田真佐子、长岛春雀、河田秋香等优秀的女学生。

汉学塾中女性对汉诗的偏好,一方面源于江户后期汉诗的蓬勃发展。这一时期,汉诗在日本的影响力显著提升,众多以汉诗教学为特色的汉学塾应运而生,如上文已提及的三所。这些学塾以其汉诗教学的卓越成就而闻名,女性在这些学塾中学习,容易形成对汉诗的偏好。比如大沼芳树,她是江户后期著名汉诗人大沼枕山(1818—1891)的女儿,一直跟随父亲在以汉诗见长的家塾大沼学舍中学习,后成长为一名汉诗人,其诗曾被浅见平藏收入《东京十才子诗》。

另一方面,女性的汉诗偏好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个人兴趣,而非汉学塾教学的直接成果。在江户时代,汉学塾及其学生处于一个具有很高自由度和独立性的教育市场之中。各家汉学塾因塾主的个人能力、兴趣和学术倾向而形成了独特的学塾特色。与此同时,学生也会因多样化的兴趣在多家学塾中学习。例如,大崎小窗虽在山本北山的奚疑塾中学习汉诗,但也曾入朝川善庵的汉学塾学习经学;片山九畹曾在高野真斋(1787—1859)门下学习儒学,并在菊池五山(1769—1849)门下学习汉诗;江马细香作为赖山阳的高徒,也曾于玉潏和尚(1751—1814)门下学习墨竹画。换言之,这些女性选择学习汉诗并且在汉诗方面取得较大成就,主要源于她们对汉诗本身的浓厚兴趣,这种兴趣促使她们主动进入合适的汉学塾学习。

在江户时代后期,部分女性对汉诗的兴趣逐渐兴起,笔者认为还有另外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汉诗本身相较于儒学、史学等较易入门和掌握,而且具有较好的交游用途;其二,中国闺秀诗集,尤其是袁枚《随园女弟子诗集》等女性诗人的作品逐渐传入日本,对当时女性汉诗人的出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sup>[25]246</sup>。

① 此处按常理应为“附尾多年悲失驥”,取自成语“附驥之尾”,意为依附先辈或名人之后而成名。但是日文底本为“付尾多年悲失驥”,谨慎起见,仍直录原文。

## 五、汉学塾女性的性别困境

一部分汉学塾女性在言行举止和穿着打扮上表现出了男性化倾向。如原采蘋常以男装打扮游历各地，汉诗人中岛棕隐(1779—1855)曾有诗《送采蘋女史赴江户采蘋筑前秋月備原真平女一号霞窗》(其一)这样描述原采蘋：

为弘家学越疆行，粉气脂香带字清。一剑霜寒当大岳采蘋常佩一口大剑，双眉绿秀照沧瀛。  
闻雁互诉离群恨，仰月高抒攀桂情。关吏他年能认否？女中亦有弃孺生。<sup>[26]10</sup>

大沼枕山的《赠原氏采蘋》也称采蘋“丈夫之胆丈夫姿”<sup>[27]12</sup>。高场乱更是如此，从小父亲就将其作为男孩培养，她长大后也常以男性自居，腰配大刀，穿裤骑行，并让养子称呼其为“养父”<sup>[28]246</sup>。

江户时期一批女性通过汉学塾的学习成为汉诗人、经学家、画家等，得以与男性汉学家交游，闯入男性的汉学世界，撕开了时代的一个口子。但是社会对她们的评价仍然很难脱离其女性性别。后藤松阴在评价江马细香时用到“女而不妇，此是小照”的话语，表明其对细香的赞扬最后的落脚点在于细香作为一名女性却没有展现当时妇女的形象做派。这被作为一种夸奖之词，刻在细香的墓志铭上。虽是出自赞扬之心，但也难掩后藤松阴对当时女性身份的看低。

细看高岛文凤的墓志铭，其中写道：“天保乙未，快烈林先生许登其门，以正月十六日初谒先生，入弟子之列。盖由其久往来于余家而不惰，又绝无艳冶之态以媚世也，林氏之门旧不许女子执贽，然得如此者，其素行不耻男子，亦可推也。”<sup>[29]562</sup>可看出，当时社会环境对女性学习汉学并不友好，而文凤之得以破例入门，须以“绝无艳冶之态”“其素行不耻男子”为前提，显示女性进入汉学师门之前，必须先通过一套以男性为标准的道德与性别规范审查，而非单纯基于汉学能力的评判。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女性进入汉学领域仍属偶发性的个案，而非常态化的教育路径。

再看高桥玉蕉，幕末明治时期著名学者大槻磐溪(1801—1878)在《赠玉蕉女史》中盛赞高桥玉蕉，称其为“翩翩女博士”：

文凤女中风，先鸣在高冈。文彩谁得比？浓州马细香。  
采蘋齐季女，志在捧管筐。红兰敬君子，梁家一孟光。  
吾奥玉蕉氏，追逐参翱翔。开肆江都市，隔纱坐讲堂。  
翩翩女博士，各自占一场。丈夫有惭色，寄语报诸郎。<sup>[30]3</sup>

但即使如高桥玉蕉这般优秀的女性汉学者，开塾授学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她并不能如男性一样正常教学，只能“隔纱坐讲堂”。

总而言之，江户时期女性的汉学道路既需要男性的引领和支持，又需要在男性的评价体系中获得认同，所以很多时候不得不削弱其作为女性的特质，不断在外形、思维、才学等方面向男性靠拢，以获得男性的认可，从而在男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汉学世界得以生存和发展，实属不易！

而且，汉学塾(汉学)经历对江户时期女性的婚姻存在较消极的影响。比如野中婉孌孑然一身，以女子之身为家族建祠，并在日本历史上一直以“女丈夫”之形象闪耀后世；大田兰香曾一度嫁于古笔了伴(1790—1853)，后离婚，出家为尼，跟随父亲生活；高岛文辉(1816—1891)是高岛文凤的养女，自小在文凤私塾中学习汉学，后成为汉诗人和教育家，曾嫁于文凤的弟弟高岛静寿，离婚后不复嫁；富冈吟松(1762—1831)为吴服商之女，曾在津阪东阳(1758—1825)门下学习汉学，后成为一名儒者和商人，终身不婚。其他如江马细香、原采蘋、迹见花蹊、高岛文凤、大田兰香、高场乱等汉学塾女性，婚姻多不如意。这从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汉学塾女性更倾向于追求个人发展和学术成就，与当时“贤妻良母”的社会要求格格不入，使得她们融入婚姻生活似乎更困难一些。

## 六、汉学塾女性的积极意义

以上笔者从女性进入汉学塾的家庭条件、汉学塾女性的汉诗偏好以及女性的性别困境三个方面讨论了江户时期汉学塾中女性的具体境遇,也印证了女性融入汉学塾的艰难。同时,笔者发现江户时期汉学塾女性的出现对日本女性教育具有明显的推进作用。前文提到的高岛文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自身通过努力成为一名有成就的女学者。其师佐藤一斋(1772—1859)撰写的《文凤高岛氏墓志》很能说明她传奇的一生:

竹雨女史名文凤高岛氏,竹雨其号也,考名就道称弥兵卫,妣盐冶氏。女史幼而聪慧好文字,入于东洲佐野氏之门学笔札,又受句读于余门人竹村悔斋,有“夙成”之称。既而悔斋物故,以文政辛巳正月念六日入余门问经业,又赏其所作文诗乞正,概无虚月,如此者有年,业大进,不让丈夫,都下称为“女学士”焉。于是每教授于两城阁内,诸亲藩亦延入后庭听其讲说,尤蒙恩眷于尾、纪两公女史。<sup>[29]562</sup>

高岛文凤开办私塾招收男女弟子,其墓志铭中写道:“男女子弟入其门而学读书、笔札暨茶仪者前后六百有余人,女子而名文笔往往出其徒云。”<sup>[29]562</sup>可见文凤门下曾有不少优秀的女学者。而且高岛文凤培养了一位优秀的后继者——高岛文辉,文辉完全继承其衣钵,继续在教育事业上努力前行。蒲生重章所写的《高岛文辉女史碑铭》有言:

(文辉)女史妙龄从高岛文凤受文学、笔札及茶仪、插花、品香,诸技皆极其奥秘。文凤酷爱之,养以为子,冒高岛氏,配弟静寿……旧川越藩侯松平君延女史以为女公子师,亦待遇甚厚,时人荣之,以为不愧曹大家也。女史为人清婉闲雅,有女德,弟子皆怀之……以是月十有一日葬于谷中天王寺之北。原铭曰:“须眉学士,往往赤贫。身家不治,何说经纶?柔荑彤管<sup>①</sup>,润屋润身。既富既德,一碑千春。”<sup>[29]563-564</sup>

从事教育的汉学塾女性还有迹见花蹊。万延元年(1860),花蹊依富豪家女子所托,在大阪开设汉学塾,教授汉学和书画<sup>[31]4</sup>。1865年在京都开塾,1870年在东京开塾,并于1875年创办迹见女子学校,开创了近代日本女性自办女子学校的先河<sup>[31]1</sup>。迹见花蹊被称为“日本女子教育界的第一人”<sup>[32]100</sup>。

再有,三轮田真佐子初为岩仓具视(1825—1883)的内殿侍讲,1879年丈夫三轮田元纲(1828—1879)去世之后,开始开设私塾谋生。1902年,真佐子在东京创办三轮田女子学校,之后一直致力于女子教育。她因对日本女子教育的巨大贡献,而被授予“勋六等宝冠章”等荣誉,并著有《女子教育要言》等教育类著作。

另据《旧闻小录》记载,大田兰香曾在父亲锦城的汉学塾中教授门人,且极受欢迎:“先大夫曰:‘余之壮也,常代父而教授门人,妹(兰香)亦与余同之,而余教之极严,妹则不然,故门人皆欲就妹而学也。’”<sup>[11]26</sup>鲈采兰(1848—1889)是幕末明治时期的汉诗人,作为著名汉诗人鲈松堂(1824—1898)的次女,她在父亲的汉学塾中学习汉诗,并曾教授汉诗和绘画,很多女性因采兰而入门<sup>[18]50</sup>。野口小蕨于1889年成为华族女学校的教授。筱田云凤在明治维新之后也曾在东京开设专门的女子私塾教授汉诗文<sup>[23]64</sup>。龟井少琴与丈夫儒医三苦源吾(1789—1852)一同开设汉学塾。上文提及的梁川星岩的汉学塾中女学生较多,这也与星岩夫人梁川红兰参与汉学塾的教学不无关系。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汉学塾女性的成长对日本当时及之后的女子教育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女教师的出现,不仅能够鼓励更多的女性入学,而且她们不同于男性的教学特质也更能

① 此处按常理应为“彤管”,意为古代女子使用的朱笔,但日文底本为“柔荑彤管”,谨慎起见,此处仍直录原文。

吸引女性就学,如此代代相传,便将学问的种子播撒到更多日本女性心中。

## 七、结 语

汉学自应神天皇时期(在位时间270—310)传入日本,经年累月,对日本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汉学受众也从皇室子弟逐渐扩展到贵族、僧侣、武士乃至平民。在江户之前的日本历史中也曾留下些许研习汉学的女性之名,如藤原赖子(?—936)、有智子内亲王(807—847)、清少纳言(约966—约1025)、紫式部(约973—约1014)等,其中紫式部的千古名作《源氏物语》直接引用和化用了诸多汉诗。但是仔细观察这些女性会发现,她们都属于贵族阶层,相关汉学素养皆来源于自学或者家庭教育。因此,江户时期(主要是后期)的部分女性(包括很多平民女性)能够在家庭之外的教学机构——汉学塾中接受汉学教育,其中小部分甚至成长为汉学塾教师,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

汉学塾女性的出现是汉学与日本女性的历史性相遇,是汉学在江户时代臻于鼎盛的一个缩影。她们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江户后期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女性自主意识逐渐增强,而此时汉学仍在男性的绝对主导之下,因此学习并掌握汉学也成为这一特殊历史节点中女性觉醒和成长的一个表现。但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些汉学塾女性的研究始终寥寥。笔者统计《日本教育史资料》中相关资料并分析江户时期汉学塾女性融入的概况,在各种史料(包括回忆录、诗集、人物传记、地方史、碑铭、游记等)中努力寻找汉学塾女性的身影,尝试对这些被淹没在历史洪流中的日本汉学女性进行一些探索与分析,希望能抛砖引玉,引发更多学者对此议题的关注与讨论。

## [参 考 文 献]

- [1] 董灏智:《江户时代日本思想界的对外扩张理论》,《历史研究》2023年第4期,第114-134,222页。
- [2] [美]埃德温·赖肖尔:《日本人》,孟胜德、刘文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 [3] 朱玲莉:《日本近世寺子屋教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 [4] 岸本芳雄:「近世日本の女子教育——女子教育の水準とその教科について」,『相模女子大学紀要』1957年第3期,39-59頁。
- [5] 张玉姣:《日本近世女子教育初探》,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编:《日本研究论集(2003)》,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5-311页。
- [6] 千住克己:「江戸時代の女子教育(現代日本教育の源流〈特集〉)」,『教育と医学』1981年第1期,54-61頁。
- [7] 高群逸枝:『女性二千六百年史』,東京:厚生閣,1940年。
- [8] 服部南郭:「中山詩稿序」,立花玉蘭:『中山詩稿』,江户:小林新兵衛,1764年,1-3頁。
- [9] 文部省総務局編:『日本教育史資料』第八册,東京:富山房,1904年。
- [10] 詹斐雯:「商家の娘から女儒へ:江戸後期女流學者高橋玉蕉の傳記について」,『學林』2020年第71卷,130-149頁。
- [11] 太田才次郎:『旧聞小録』卷上,東京:太田才次郎,1939年。
- [12] 中村秋人編:『名媛と筆蹟』,東京:博文館,1909年。
- [13] 三輪田真佐子:『三輪田真佐子:教へ草』,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5年。
- [14] 會田範治、原田春乃編:『近世女流文人伝』,東京:明治書院,1960年。
- [15] 李天纲、张安庆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005:王韬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
- [16] 大垣市編:『大垣市史』卷中,大垣:大垣市,1930年。
- [17] 藤井瑞枝編:『花の下みち:跡見花蹊先生實傳』,東京:実業之日本社,1919年。

- [18] 小谷喜久江:「原采蘋と房総の漢詩人—『東遊漫草』に見える交流」,『日本大学大学院総合社会情報研究科紀要』2012年第13号,39-50頁。
- [19] [日]小谷喜久江:《官妓詩人薛濤と遊歴詩人原采蘋の対比研究——成功の陰の内面の葛藤》,见刘晓芳主编:《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大学日语教育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5)》,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3-190頁。
- [20] 広瀬淡窓:「遠思樓詩鈔」,広瀬淡窓著、日田郡教育会編:『淡窓全集』中巻,日田町:日田郡教育会,1926年,1-49頁。
- [21] 俞樾編:《东瀛诗选》卷四十,曹昇之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 [22] 江馬細香:『湘夢遺稿』巻之下,東京:和泉屋吉兵衛等,1871年。
- [23] 下田己酉俱樂部編:『下田の栞』,下田:下田己酉俱樂部,1914年。
- [24] マーク ボーラー:「山本北山年譜稿」,『成蹊国文』1997年第30号記念号,101-125頁。
- [25] 柯明:「江戸女性漢詩の出現——その『育成』に関する一考察」,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編:『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第67輯,東京: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22年,245-261頁。
- [26] 鷗規景寛甫:『棕隱軒四集』下,京都:堺屋伊兵衛,[出版时间不详]。
- [27] 大沼枕山:『枕山詩鈔』巻之下,植村義校,江戸:下穀吟社,1859年。
- [28] 安藤徳器:『趣味の維新外史』,東京:日本公論社,1934年。
- [29] 磯ヶ谷紫江:『墓碑史蹟研究』第5巻,東京:後苑荘,1927年。
- [30] 大槻磐溪:『磐溪詩鈔一百詩』,『寧静閣二集』中,[出版地不详]:鴻漸齋,1858年。
- [31] 花溪日記編集委員会編:『跡見花溪略歴上段』,2023年7月28日,<https://www.atomi.ac.jp/univ/kakei/PDF/1-01-01Rireki.pdf>,2024年12月12日。
- [32] 高橋勝介:『跡見花溪女史伝』,東京:東京出版社,1932年。

## Historical Encounters Between *Kangaku* and Japanese Women: A Study of Women in *Kangakujuku* During the Edo Period (1603-1868)

Zhang Xiaofei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The Edo Period in Japan was a period of promoting culture and education, with significant advancements made in various fields of education, including female education. However, female education was primarily limited to family and *terakoya* education, while the field of Chinese Learning remained male-dominated with very few females, and research on women in *kangakujuku* (Chinese learning academy) during the Edo Period was also very rare.

This paper begins by examining data from *Nihon Kyoiku Shiryo* and presents statistics on *kangakujuku* in Tokyo, Kyoto and Osaka and seven local prefectures to shed light on the status of females in *kangakujuku* during the Edo Period. It reveals that (1) most of *kangakujuku* women appeared in the late Edo Period; (2) *kangakujuku* in Tokyo, Kyoto and Osaka had a higher proportion of female students compared with other local counties; (3) female teachers were extremely rare at *kangakujuku* during the Edo Period.

In the Edo Period, women in *kangakujuku* generally showed the following distinctive features: firstly, women in *kangakujuku* basically came from the families of intellectuals such as Confucians or medical doctors. Families of Confucians and doctors generally had a strong atmosphere of Chinese studies and knowledge accumulation, and some of them even operated *kangakujuku* at home, which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ultivating women with interest in and qualifications of Chinese studies. Secondly, women in *kangakujuku* were mostly supported and cultivated by male members of the family

(mainly fathers and husbands). Because during the Edo Period, Chinese studies and *kanji* were complementary to men, and Japanese studies and kana were mutually dependent on women, the time-consuming and costly study of Chinese studies at a private academy was not a necessary option for women during this period. Therefore, women in *kangakujuku* hardly appeared without the firm support and help of their fathers or husbands in the family. Furthermore, *kangakujuku* women showed a clear bias towards *kanshi* (Chinese poetry) in both their studies and career development, and many of them grew up to be Chinese poets, whereas Confucianism, which was the core essence of Chinese learning, was a field in which *kangakujuku* women were less involved or specialized. This is mainly because *kanshi* is easier to learn and master than Confucianism, and *kanshi* has a better social function, as well as the introduction of Yuan Mei's (1716-1798) Chinese female poet collection at that time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emergence of female Chinese poets in that period. Finally, in order to integrate into the male-dominated field of *kangaku*, women in *kangakujuku* had to somewhat discard their feminine qualities and become closer to men in terms of talent and dress. However, it has to be admitted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escape the evaluation of women in *kangakujuku* by their gender, and that the *kangakujuku* experience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women's marriages.

We have discussed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women in *kangakujuku* in the Edo Period from three aspects: the family conditions for women to enter *kangakujuku*, the *kanshi* preference and career orientation of *kangakujuku* women, and the gender dilemma of being a *kangakujuku* woman, which also confirms the difficulty of women's integration into *kangakujuku*.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be found that the emergence of women in *kangakujuku* during the Edo Period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s education in Japan. The emergence of female teachers not only encouraged more women to enroll in the school, but also attracted women with their different teaching qualities from those of men, so that the seeds of learning were sown into the hearts of more Japanese women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Chinese studies in Japan have always been dominated by men, but in the Edo Period (mainly in the late period), a small number of women were able to receive *kangaku* education in *kangakujuku*, and a very small number of women were even able to become *kangaku* teachers, which is a very rare and noteworthy historical phenomenon.

**Key words:** Japan; the Edo Period; *kangakujuku*; women

